

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好像没有见过冰棍，雪糕就更不敢想了。

应该是二年级了，柳南的街道上有了卖冰棍的，二分钱一根。白色泛着点黄。如果是红色的，就是三分钱一根了。记忆中，在柳南一条街，好像只有长风剧场和柳南菜市场附近各有一个推着一个白色木箱叫卖冰棍的。叫卖声是“冰棍”，后面拉长了音调，“二分一根”，短促的发音连在一起。那时的冰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对冰棍不抱幻想，倒是对卖冰棍的箱子有兴趣。那种箱子里面都包着棉被。那时不知道制冷也需要保温，总觉得包着棉被，里面的冰棍不是更容易化好了。同学之间就这个问题猜想了好几次，结论是卖冰棍的自己想吃，快化了，他就可以吃掉，不挨骂。

雪糕是在钟楼街副食品市场第一次见到。记得是五分钱一根。第一印象是有了包装纸，打不开不像冰棍那样透明，感觉像是白面糊糊冻成的。再有就是雪糕棒是扁平的，不像冰棍的是一个长方体的棍。那时的钟楼街是太原市的商业中心，但在大街上拿着雪糕的很少。上五年级时(1964年)，学校组织去动物园。从动物园出来，老师领到解放路口，队伍就散了。炎热的夏天，没有一个同学去买一根雪糕。我跟着母亲在柳南菜市场(那时叫鲜菜商场)买西红柿，五分钱可以买一筐(跟现在啤酒瓶那筐差不多)。五分钱的重要性可以在菜价上体现，尤其是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雪糕真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曾经有一阵风传一种说法，有商店收购雪糕棒，还有说是一百根雪糕棒可以换一根雪糕。听到这种消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便有意识地看着路面，这才发现，街道上雪糕棒少得可怜。四趟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时捡不到一根雪糕棒。如此艰难的“寻宝”经历，彻底放弃了“自食其力”尝一尝雪糕味道的想法。所以，至今也不知道雪糕棒换雪糕这个消息的真伪。到了知天命之年，同学聚会，聊起小时候的糗事，好几位也和我一样，有过“自食其力”尝一尝雪糕味道的幻想。

参加工作后，每月有了固定的工资。冰棍已经开始改变了模样，出现了老冰棍、橘子、桃子等口味，有的进行了包装，比较高级的是三种颜色和红豆、绿豆冰棍。里面添加了豆子，吃起来感觉不是纯粹的冰坨子了，价格也

那时的雪糕

融化在回忆的温馨里

孙瑾



开始提升，最贵的到了一角钱。

上世纪70年代末期，雪糕开始提价。配料不知道改变没有，外面的包装纸档次高了。雪糕吃了，包装纸洗干净还可以成为孩子们折纸的材料。随着包装纸的变化，一种外包装是塑料的“冰砖”进入了市场。价格到了三至五角钱。包装上标注的口味五花八门。奶油、巧克力、香蕉、夹心各种各样，我现在也不知道，冰砖与雪糕有什么区别。巧克力那时很少见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院的邻居夏日聊天，讲述听过但没吃过的东西，答案放到现在真是不可置信，涮羊肉、竹笋在列。有人提到巧克力，马上被否决了，雪糕里有。

价格提高，名称改变，形状也开始增加。最早是娃娃头，可爱的造型很容易吸引孩子们的目光。经历了巧克力的“神秘”，让我总觉得这种雪糕吸引大人人们的，可能是娃娃头那头发、眼睛、嘴巴咖啡色的“巧克力”。香蕉、玉米、雪人这些造型紧随其后，开始各显神通。由于不喝牛奶的缘故，在少有的几次“享受”这些雪糕或冰砖的时候，选择了绿豆沙。一口咬下去很足的豆味，一股沙沙的感觉，入口即化。

上世纪70年代，雪糕也好，冰砖也好，基本集中在市区和几个大的工矿区。夏天，我只要骑车去柴村(当时的北郊区政府所在地，我二哥毕业后分配在那里)，母亲总要我带一个饭盒，在万柏林买上几块冰砖或雪糕放在里面，后面的路程就需要加快速度，以便于在冰砖或雪糕没有融化前，到柴村给侄女解解馋。大哥成家后住在万柏林，柴村之行，在回来的时候增加了一个项目，拐进万柏林邮局宿舍，给侄儿买一根冰砖。那时印象中太原市没有冰激凌，一根冰砖或雪糕可以带给孩子们很长时间的快乐。

连载

以至于天气已经变冷以后，孩子们看到我，想到的不是雪糕就是冰砖。

冰棍、雪糕、冰砖是怎么制成的，一直是我们小时候议论的话题。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冬天，在文瀛公园会有取冰的时候。工人们将结冰的湖水，钻开一个大洞，把冰切割成一块块一米以上的方块。两人一组，将冰块抬上岸，听大人们说，这种冰块会运到冰窖保存起来，夏天时拿出来用。上世纪70年代初的迎泽大街南海街口还是一大片空地，在那儿见到了可能就是大人们所说的“冰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坑，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大冰块，上面盖着草袋子，草袋子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黄土。几岁的孩子，看到了公园取冰的情形，很自然就联想到了冰棍。上小学不久，因为冰棍是怎么做出来的，男同学分成了两派。大多数认为冰棍是公园湖水的大冰块切成的。贫穷限制了想象，当时竟然没有一个孩子质疑红色的冰棍是怎么来的。

帽儿巷改造成食品街，南面出现了一个专卖冷饮的“雪山冷饮厅”。在那里看到了冰激凌，有特色的是蛋卷冰激凌，脆脆的蛋皮里装着冰激凌，在蛋皮上面呈现一个螺旋状，价格记不清了。因为我到那里大多数是骑自行车，所以买上就走。印象中好像蛋皮就一种，冰激凌有好几种，价格也不同。“雪山冷饮厅”的蛋

卷冰激凌，我买回去，老母亲告我，冰激凌不像冰砖那么凉，一个蛋皮，里面也放不了多少冰激凌。科技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与习惯。对于冰激凌价格是雪糕的几倍，已经可以在味觉满足之后考虑了。

本世纪初，去哈尔滨出差，下榻酒店就在中央大街附近，几个人慢慢走到了这条著名的百年老街。商店门前的一支队伍吸引我们停住了脚步。几个简单的包装箱里，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冰棍，两个售货员站在箱子后面。箱子上放着价格标签，没有喇叭吆喝，也没有宣传画点缀，只有上方蓝色牌匾写着“中华老字号”“马迭尔冰棍”。寒冬腊月咬上一口马迭尔老冰棍是什么感觉？看着身穿貂皮大衣的女性，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嘴边一阵白雾飘过，瞬间帽子外的头发挂上了一层白霜。我们赶紧收紧衣服，没有一丝一毫想体验的冲动。

市场经济下的冷饮市场，这几年同样出现了变化。“文创雪糕”在各个景区大量出现，给孩子们买下，那些精美的造型让人不舍得送入嘴里。各种地方特产也加入了这种变化，醋味、酱油芝士、榴莲、黄酒冰激凌也相继出现。网上还出现了一种小龙虾冰棍图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本版手绘：王春波

现在还起不到什么作用。有这篇《惟其是脆嫩》，就足以说明她在文坛的分量了。毕竟是在一个家庭里，再怎样的风光，也忘不了她主妇的责任。这就要说到梁思成这一时期古建筑考察了。

1933年上半年，梁思成等人已经完成了对蓟县(今天津蓟州区)独乐寺、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的考察，经验与判断力都逐渐走向成熟。河北是平原，又是战乱之地，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多为明清两代的，宋元建筑不多，唐代建筑就更不会有了。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相邻的山西省。

梁思成在山西做古建筑考察，是个大题目，我们会有专节谈到。这里只说头一次，就是1933年9月去山西那次。两人一起去了大同，同去的还有

新加入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大同完了又去了应县。林徽因没去应县，在大同待了三天就回去了。那时候北平到大同通火车，叫平绥路，北平到绥远，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路过大同，来去很方便。

第一次为什么去，去了又为什么待了三天就回去了，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前一年梁思成去了独乐寺，回来就出了林徽因跟金岳霖那档子事，再出去就多了个心眼，带上了夫人。而那时林徽因身体不好，大同是在城里，走动也还方便，去应县没火车，要坐汽车，就不方便了。凡事都要从常人这边理解，一通百通，全在情理之中。

知道下一节要说什么，我甚至想，她真不该回去，在大同待到丈夫考察完应县木塔回到大同，再一起回去，那时



35

韩石山 著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进入10月了，至少可以避开一个人面对《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尴尬。

7.遇上了克星：冰心和她的《我们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回到北京十几天后，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

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这在当时的北平文坛是轰动性的大事，就是八九十年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毕竟两个都是著名的作家，毕竟两个是曾有过交情的女人。

这里，在日期上要厘清。《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刚刚办起的。1933年9月23日刚刚发了创刊号即第一期。刊头公告里说，每星期三、六出版。《我们太太的客厅》是连载的，从9月27日第二期起，到10月25日(星期三)第十期止，登了九期。想来那些天，北京城的文化界人士，人人都在等着看谢冰心这个女人怎样挖苦嘲弄林徽因这个大美人。

对报纸来说，是绝大的成功。《文艺副刊》一炮打响。

现在的问题来了，沈从文编的副刊，怎么会刊出这样作

贱林大小姐的作品。

这道理，我前面已说了。主持这个副刊的是杨振声。杨振声是清华学校出来，留美的，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是清华出来留美的，冰心随丈夫出国，也是留美的。三人原本就是老相识。《文艺副刊》办起来，杨先生肯定会向谢女士索稿。谢女士给了稿，再不肯愿，也得刊登。从办副刊上考虑，正是求之不得的能引起轰动的好稿子。也就是说，这事儿是由不得沈从文的。杨振声拿来了，没二话，只有登。这样的刊发，就是林大小姐知道了，也没有脾气。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小说。“太太客厅”，是当时文化人之间的一个玩笑话，若说有什么含义的话，只能说对梁思成先生有些不敬。

随笔